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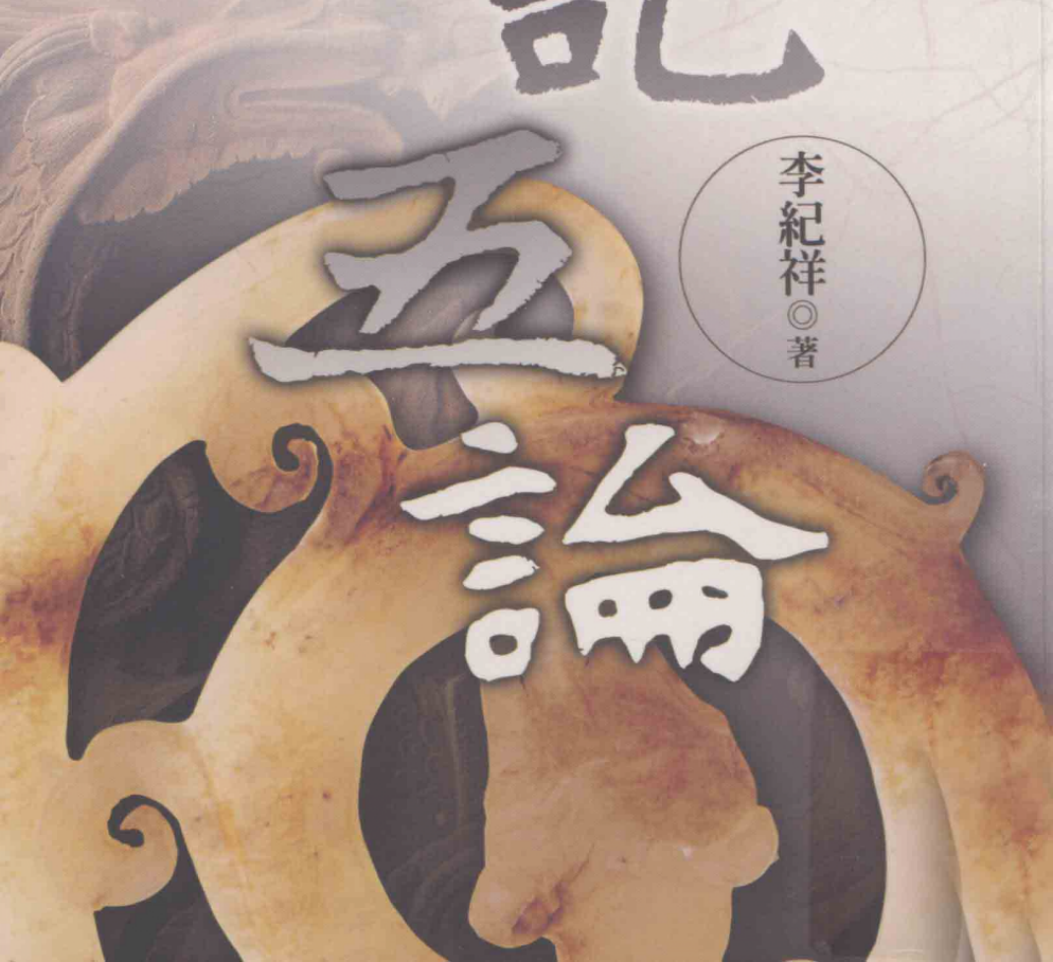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一九

史記



五論



李紀祥◎著

文史哲大系 219
李紀祥 著

《史記》五論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史記》五論 / 李紀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7. 09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219)

ISBN 978-957-668-835-5(平裝)

1. 史記 2. 史學評論

610.11

96016302

文史哲大系 ②19

《史記》五論

著 作 者：李 紀 祥

發 行 人：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 址：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02)23636464 傳 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2007 年 9 月一刷 新台幣 300 元

ISBN 978-957-668-835-5

自序

筆者對《太史公書》自弱冠前便有所好，這實當歸諸於高中時代的國文老師；他上課時念古文，真是好聽極了，那聲音裏的節奏，在在見證了文之深、美否，是可自「聞／聽」來受其授的！在那少年青澀時，我們都背誦了〈報任少卿書〉。當然，後來也決未想到大學聯考進入的是史學的專業！

這本《史記五論》所收乃是筆者對於司馬遷這本自稱為「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書》所習所學的一點研究心得。時下坊間實不乏對《史記》成書意義及名篇選覽導讀之書，不論是已成名著的《太史公書知意》、《史記菁華錄》、《太史公書義法》等等或是近人的課餘作品。吟誦古文，在其音調節奏間感受其文之澎湃、低迴、悲慟，彷彿作者伏案之低語，又或是對著前賢的系譜對憐身世遭遇之相仿；乃至於「非附青雲之士」、閭巷俚儻非常之人，欲傳其狀的敘事與書寫，在在都已透過這本非由司馬遷自署的《史記》文本問世在今。《文心》云「居今識古」，本書則不敢若是，蓋深知居前導覽之不易，是故其初亦不過欲思太史公所自謂之「一

家之言」，欲思其何以「成」、又何以「能成」諸問題而已？簡冊于大難之後果得「藏諸名山」、傳諸後世，太史公此書之後代身世流傳確實精采，諸本之流逝宛若歷史之篇章蕩漾於時間長河中；筆者雖不欲窺而不可，不得不窺；欲入，而終始迷途其大塊之林，若於〈伯夷傳〉中所喟：「倘所謂天道，余甚惑焉！」古今文章之動心絕倫者實莫若史公！筆者涓滴初窺，一點點的心得書寫與研究行文，遂成此小書，雖顏曰「史記五論」，實亦愧方家大雅爾！

附錄中另收入今人黃聖修君所撰〈《史記》「柯之盟」探原〉一篇，其文曾獲中國歷史學會第三屆「全國大學院校歷史所博碩士生論文發表會」第一名，與書中筆者所撰之〈柯之盟與曹沫〉意趣取徑雖不相同，而論述與資料則更為加詳，故激得黃君同意，附收入本書中，讀者可以併讀。

李紀祥 序於太平洋畔林美山麓之鳶飛書室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

《史記》五論

目 次

自序·····	01
《太史公書》由「子」之「史」考·····	1
一、前言·····	1
二、由漢世若干資料看《太史公書》之性質·····	7
三、由「子書」到「史記家」的形成·····	35
四、《太史公書》稱名《史記》與「史」義之轉向·····	46
五、紀傳作為「史書」體裁的確立·····	74
六、結語·····	87
《史記》之「家言」與「史書」性質論·····	93
一、《太史公書》的「諸子」與「家言」性格·····	93
二、司馬遷之造史意識·····	98
三、班固《漢書·藝文志》的看法·····	101

四、結語	106
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別解	109
歷史與歷史劇——「豫讓」敘事與歷史塑成	127
一、前言	127
二、大時代敘事的三種取向	129
三、《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豫讓」敘事——死亡與不朽之書寫	143
四、王小棣的《音容劫》	154
五、結語	163
曹沫與柯之盟	165
一、前言	165
二、柯之盟——「受命之伯」與「始霸」	169
三、曹沫爲傳主——《史記·刺客列傳》對曹沫的定位與書寫	187
四、餘論	206
附錄：《史記》「柯之盟」探原	209
書影	267
黃聖修	

《太史公書》由「子」之「史」考*

一、前言

在我人一般印象中，多視《史記》為一種「史書」性質之作品，或者進一步視之為「正史」之首，「紀傳體」之開創者。形成此種印象，其來有自。然而，關於《史記》之為何種屬性之觀點，筆者認為，並非即為一種固定不變之認知，即使我人今日已形成一種常識印象，此一認知印象亦決非片刻即成，或天生如此，而當係經歷一時間上之演歷後方得形成如此，此種動態性格吾人可以稱之為歷史形成。愈是常識化之印象，愈是須經由歷

*本文原擬充作拙文〈《史記》為「家言」與「史書」性質論〉的補證，探求《史記》本稱《太史公書》原是一種子書的性格。初稿原題〈再論《史記》性質書〉，但後來牽涉既廣，且涉入對《太史公書》如何由「子」書演為「史」書的歷史探討，便不得不擴充篇幅，思於前賢研究之基上，提出一己之考察意見，乃撰成此文，並署以新題，就教於方家。

史地觀察來揭示其成形過程。因此，在成形為今日《史記》為「史書」觀點之前，《史記》為何種屬性之書？又是如何形成為今日我人認知中的史書屬性或紀傳體史書？我人用「史書」此一措詞去指稱其屬性時，此一「史書」概念係後起？抑或司馬遷在世時即有此概念與用法？僅僅是如上提問，便有可能動搖現存於吾人印象中之認知穩定性。本文即思自「《史記》是史書」此一認知印象之揭示入手，考察此一認知究係如何在歷史之中形成。

近人邊耀東氏曾經提出過一種考察觀點，其要旨即在於闡明所謂的「史學」「史部」觀念之成立，乃為自東漢迄魏晉以來，一種漸由經學脫離之而獨立成部成學的歷史發展，透過此一觀點，吾人已漸曉《史記》之在今日被視為「史書」，其實乃魏晉以來四部成立後之觀點，以乙部之史書性格視《史記》。逮唐代官方之《隋書·經籍志》及私修之《史通》，不僅繼承魏晉以來史部成立之觀點，且進一步更將《史記》列於史部分類之第一類——正史類之首，便標誌著此種轉變之完成。^①

晚近又另有一種觀點，由雷家驥氏提出，其意大要謂《隋志》史部中之前二類：正史

①參邊耀東，〈從隋書經籍志史部形成論魏晉史學轉變的歷程〉，《食貨復刊》十卷四期（民國六十九年十月），頁一二一～一四二；〈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大陸雜誌》七十一卷六期（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頁一七八。

類與古史類，其實即《史通》中之「古今正史」，因而以《史記》為首，體裁為紀傳體之「今史」，即為相對於編年「古史」之「新史」；此一新史，肇端自太史公之《史記》；迄魏晉至隋唐，中間有一「新史學運動」，並在性質上，以「實徵」為信史，有別於孔子以《春秋》為首之「褒貶史學」之編年古史，是為中國史學之二大門類，雷氏並分別以「太史簡」與「董狐筆」象徵稱之。^②此一以《史記》為新史學運動起點之觀點，顯與前述遂氏魏晉以來史學、史部脫離經學方得成立之觀點相異，但又相曲相映，唯取徑及研究視野實不相侔。要之，遂氏謂《漢書·藝文志》中「春秋類」下諸史書，由本無其類而至有其類，亦即為一種「史學」獨立與脫離經學之過程；雷氏則將「新史學運動」發展之起點，上移至太史公之《史記》。

另外尚有一種關於《史記》之原的觀點，歷來較少為學者所注意，此一觀點係視司馬遷之書原為一種諸子書之性質，如清代章學誠，便曾一言論及《史記》為「諸子之遺」，其云：

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③

^② 參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〇年），頁一〇五〇，〈第一章序論〉及〈第二章 司馬遷的「新史學」及其觀念意識〉。

惟章氏言《史記》之諸子義，似僅見於此篇，未見其有進一步細論。民國高步瀛氏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箋證》中也曾提及《史記》之旨趣與子家相近，謂：

案《史記》一書，《漢志》列「春秋家」，《隋志》以來，冠正史之首。史公春秋之學，出於董子，大義實主《公羊》。其《報任安書》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故其旨趣，與子家相近，而非若後世之史，沾沾於簿記之爲者。^④

又近人程金造氏於其著《史記管窺》之〈自序〉中亦有載及其師高氏之言：

始余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同學王重民、劉汝霖教以多從高閬仙先生學。……因常向高先生請問《史記》中事。先生一日嘗言：「大約太史公書，是借史事爲題材，其性質與諸子務治之者相近。」^⑤

③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外篇卷七，〈亳州志掌故例議上〉，頁八一—。

④ 高步瀛，《史記太史公自序箋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期，頁三〇。

⑤ 程金造，《史記管窺》（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自序〉，頁一—三。

侯外廬氏於《中國思想通史》中亦偶及此義：

司馬遷用一生精力所寫成的偉大著作《太史公書》，即後人所稱的編於廿四史首部的《史記》。這是一部繼承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傳統的私人著述。^⑥

阮芝生氏論文《司馬遷的史學與歷史思想》結論中亦云：

先秦諸子，各名一家，西漢去戰國未遠，司馬遷承戰國諸子遺風，其所著書亦「成一家之言」，故史記雖是史書，而帶有子書的性質，它不是官書的「記注」，而是私人的「撰述」，所以才說「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⑦

若上述諸引文其可提供一探詢之新角度，則乙部觀點固為魏晉以來迄於唐所逐漸，因之以《史記》為「新史學」之開端，或以史部史學為「附庸」於六藝經學，其皆不免皆為已來雜後起眼光之回視。故魏晉以來之所謂「史部」「乙部」，已非先秦「史」字之舊義，即

⑥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頁一二七。

⑦ 阮芝生，《司馬遷的史學與歷史思想》（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七三年），〈第八章 結論〉，頁四〇六。

所謂以「人」爲史與以「書」爲史之差異及演變已在歷史中形成。而吾人亦可一問：今既以史學、史部之「史」字用義爲後起，則在司馬遷之生世，若後起之「史」義尙未形成，史公之造《太史公書》之意識爲何？又其本人視《太史公書》爲何種性質之書？且吾人更應知西漢之世並無史官，先秦往舊之史官諸「史」，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職，在經春秋、戰國以來迄於秦代之後，已有極大之變化，觀念意識上亦非昔日之舊；換言之，其中一種與「史」深相關連之新發展正在蘊釀卻未必成形，而其初亦未必是用「史」字來表達此種觀念與意識，「史」字之義既歷經轉變，新起之義乃魏晉以來所「著形」「後起」，則漢世之人包括太史公自己，是如何看待這部被後人視作「史書」之《史記》？西漢之世，既無史官，又無史類，班固《漢書·藝文志》即將《太史公書》一書附列於「六藝略」之「春秋類」下；除了班固之外，或班固之前，在漢人意識與觀念中，如何看待太史公此一「一家之言」？綜上所述，則有關《史記》一書之性質者，至少吾人可知，決非單一地說是「史書」即可一言而定，它牽涉到以「史書」視之，乃後來之觀點，則原來之性質爲何？又如何在歷史中演歷形成一種「史書」性質之觀點？有關《史記》一書之性質，遂成一複雜之歷史問題。一如《春秋》一書，吾人視爲五經或六藝之一，乃漢代或戰國以來之觀點，則《春秋》原先當爲何種性質之書？它又是如何演變成爲「經」？有些視爲理所當然的現象，經由一種有意識的提問，並將之置於歷史的流變中考察之後，

就會變得複雜起來，而成爲一個吾人必須前去探究闡明的重要課題。

本文的撰寫旨趣在於斯，在若干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礎之上，將既成的《史記》爲「史書」之觀點置回歷史脈絡的流變中，看看《史記》一書在起點上，究應是何性質之書。如又或者更能闡明《史記》在通向東漢、魏晉的演變過程中，如何形成一種新的門類觀點，在魏晉被納入「史部」中，在《隋志》被納入「正史類」中，在《史通》中被稱爲「史記家」、「今正史」、「紀傳體」的形成過程。

二、由漢世若干資料看《太史公書》之性質

正如前言中所言，西漢之世實無史官，當然，這個「漢無史官」的「史官」之義，仍是用後起之「撰寫或記錄歷史」的意義來看待，才能說漢無史官。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所職，乃太史令，而太史令一職在漢世時屬於天官性質，司掌天文及曆法，雖仍與先秦「太史」古職相通，但卻並非後世意義之下所指稱者——撰述記錄「歷史」之「史官」，我們說漢代史官之有無，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並非僅從漢代職官中有無名稱爲「史」者就可遽下論斷；因爲後世意義下的史官，是從「史書」之義而來，「史書」義確定，則撰寫「史書」的人，官方的便稱史官，私人的則稱史家。因此，如果是從後世意義下的「史

官」來看漢代司馬遷的任職太史令，則太史令是不能稱為史官的，太史令在漢武時的職掌應是天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之語云：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宜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周代之「太史」，據今人張辛〈說左史、右史〉一文之所考，實即主掌天事、天象、曆法等職之史官，常居於王之右；與居於王之左，掌記人事、冊命的「內史」不同；分別為兩種不同來源的史官系統。^⑧因此，司馬氏累世職官，典掌天官事，正是出於其先人之

爲周室之太史，這個傳統雖然經由司馬氏之累世傳承而於漢世仍司太史職，然這個太史職典掌的卻仍是天官事，而不是後世意義下的記錄或撰述歷史性格史書的史官，也不是另一系統性格下的掌人事、記錄王命的內史職；由此，吾人再閱讀〈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述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此段述文中何以會出現一句「不治民」？我們的理解，正是來自於司馬氏世典天官之太史職的傳統，反映了司馬遷父子對自我本職的認知，係由太史、內史二種系統之分的傳統而

⑧見張辛，〈說左史、右史〉，《文獻》第二十輯，頁六九、九二。文中考辨左史、右史係由居王之左、右而爲稱，與五史爲職稱不同。張文又區辨左史乃太史，右史乃內史一系。與他文之釋左、右史者有其異趣。亦見徐復觀，〈原史〉（收在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輯》冊三，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一、七二。文要點之一，即判定祭神之「冊」與王者詔告臣下的「冊命」爲周世史職之二大職守，正符張氏之釋。又清末民國以來，吳大澂、章太炎、王國維、朱希祖、胡適、沈剛伯、勞幹、戴君仁諸氏皆有「釋史」論文之作，其正代表一種重新探究《說文》以「記事」釋「史」之趨向，上述諸文既折解了「史」字義之固定性格，亦指出了「史」字本身即蘊含了「歷史」可以探究。而諸文亦可以區別爲二大類徵：即執弓鑽之神權時代性格與執簡、執筆之王權時代性格。反映出其中有一以「史」字作爲「角色」之歷史正被言說。

來，而在官司所職這一點上，根本還未扯上「史官」撰述史文、史書的問題。或曰，既然太史令本職只典天事，則何以司馬氏父子對話中，仍有「勿使史文放絕」之類的語句出現，則徐朔方氏在《史漢論稿》中有一段分析，頗能道出一種述作意識出現在《太史公自序》父子對話中的真相，徐氏云：

司馬談臨終時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言論著矣。……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這一番話，既表明了司馬談父子不甘於「近乎卜祝之間」的地位，想以《史記》的著作「立身揚名於後世」，另外也因爲當時沒有專職的歷史編修官，司馬談父子才以古代太史的職責勉勵自己，這種心情是不難理解的。但如果因此而認爲寫作《史記》是太史令的本職，那就不符合事實了。⑨

⑨ 徐朔方，《史漢論稿》（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頁七六、七七。